

学术月刊 丛书
Academic Monthly

破碎与重建

1937—1945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

郜元宝 等著 张 曦 选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学术月刊 丛书
Academic Monthly

金福林 主编

破碎与重建

1937—1945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

郜元宝 等著 张 曦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破碎与重建: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1937~
1945/郜元宝等著;张曦选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5

(学术月刊丛书/金福林主编)

ISBN 978-7-208-13283-2

I. ①破… II. ①郜… ②张… III. ①抗战文艺研究-
中国-1937~1945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5325 号

责任编辑 熊捷

封面设计 肖晋兴

• 学术月刊丛书 •

破碎与重建:1937—1945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

郜元宝 等著 张曦 选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5.5 插页 2 字数 221,000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283-2/I·1437

定价 42.00 元

序

《学术月刊》创于1957年1月,作为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几家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之一,其于我国学术思想文化界的影响一直延续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过境迁,今天的同类期刊多以数千计,《学术月刊》依然能够保持其原有的办刊传统并在同类学术期刊中居于领先地位,这既得益于学术界的长期支持,也是编辑部同仁长期坚守的结果。

毋庸置疑,传统纸质学术期刊出版事业正面临移动互联网技术革命带来的诸多影响,内容生产、制作、传播的数字化正在消解和改变学术传统生产和出版的样式乃至生态,信息获取的即时化和阅读的碎片化、娱乐化,更是直接分流了固有偏好严肃内容阅读的大量读者,人们似乎不再像印刷传播时代那样渴求深邃的思想和系统的知识,而诸如原创乏力、考评重量轻质等学术生产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大大削弱了学术期刊应有的影响力。

近几年来学术期刊发行或订阅数的萎缩与停滞已成无法反转的趋势,同时一些商业或公益性数字化平台正式发挥其数字化传播的优势,以替代传统的纸质阅读和检索,这大大便利了数字化时代的学术传播与阅读。但这种趋势提醒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学术期刊出版的公益化趋势,即对学术期刊出版的评价不能再囿于发行数等经营指标,而应在内容的阅读和影响等方面建立起新的评价体系。

如此,如何放大、提升学术期刊优秀内容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就成为了学术期刊在今天与未来要有价值地生存下去所必然要去破解的或着力去做的重要工作方向。

“学术月刊丛书”的编辑出版,即旨在精选历年所刊优秀论文,以专题的形式呈现,弥补刊发时序的零星,俾使不掩当代学人的经年累积,以利于人文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专业教学和研究者参阅,收其优秀学术成果嘉惠后学的应有功德。

是为序。

《学术月刊》总编辑 金福林

目 录

序 I

1942 年的汉语 郜元宝

国统区文学

现代“文学自我”探索中的“九叶诗派” 杜心源 33

对话何以不可能——从一场论战看作家巴金与信仰的距离 刘律廷 48

“文学的国语”怎样炼成——《围城》的语言策略 郜元宝 65

20 世纪 40 年代重庆左翼文艺界的论争 吴中杰 83

路翎生命原始强力向度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曹万生 袁 昊 102

论七月派与审美现代性 刘东玲 119

解放区文学

反思与重启：延安文学及其研究的当代性 王富仁 朱鸿召 袁盛勇 131

论后期延安文学中的“语言”	袁盛勇	149
三仙姑形象的多重文化隐喻——重读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王宇	159
再谈“民国”的文学史意义——以延安时期文学研究为例	周维东	175

沦陷区文学

传奇与日常：张爱玲小说的双向改造过程	朱志荣	191
短篇题材的重写：萧红居港期间的小说创作	林幸谦 郭淑梅	210
自由的心境——从《北京苦住庵记》说起	郜元宝	224

1942 年的汉语

郜元宝*

一、1942 年：新的文学群落的崛起

1942 年，是现代中国文坛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作为战时中国文化重要一翼的文学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成熟。我所谓的“成熟”，是指到那时为止，中国现代文学新旧各种元素都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与各得其宜的安排。

这在文学语言方面尤有直观呈现。似乎完全出于偶然，一批新作家都是在 1942 年前后一两年内创作并发表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他们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教育程度和价值立场都迥然有别，语言风格更各不相同，所以令人无法轻易看出彼此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在这个特殊的年度，中国文学仿佛突然迸裂开来，朝着东（上海）、南（云南）、西（重庆）、北（延安）四个不同的方向分头演进了。

*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西南联合大学,一个年轻的作者群正迅速成长,从他们中间很快走出了传奇般的诗人穆旦,而站在他们背后的则是刚刚结束逃亡生活、困居学院的中国文学的神圣家族。这里有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冯至、陈梦家、林徽因、卞之琳等二三十年代成名的作家,也有为中国文学推波助澜的作家型学者吴宓、朱光潜、李广田、叶公超、洪谦、冯友兰以及青年学者钱锺书、夏济安、赵罗蕤,包括战时滞留中国的英国诗学专家燕卜苏与现代诗人奥登。这里不仅有对从《诗经》、《楚辞》到“五四”新文学的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细心讲求,也有对 T.S.艾略特所谓一个人二十五岁还准备写诗就必须将整个装在头脑里的从荷马到莎士比亚直至现代英国文学的系统介绍与深入研读。^①穆旦正是在这一特殊的文化环境中贪婪地汲取营养,由此成就了他个性鲜明的诗风。1942年,继《合唱》、《玫瑰之歌》、《赞美》之后,他完成了著名的《诗八章》。同年5月,冯至前一年在灵感突发状态一气呵成的《十四行集》也告出版。也是在这年的2月,以西南联大师生为主体的“文聚社”刊物《文聚》创刊,居首的就是穆旦的诗《赞美》。^②

穆旦、冯至 1942 年前后的诗作,无疑是这个流亡文人群落最值得骄傲的收获。穆诗在理解西方语言的基础上大胆欧化,使“五四”时代即已开始备受讥诮的“恶劣的欧化”合法化了。“五四”时期,许多人都认为白话文有必要向西洋文学学习,但真正大张旗鼓提倡“欧化”的是傅斯年,他认为白话文除口语之外,另一个更高等的凭借“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的国语的文学”,“要使得我们的白话文成就了文学文,惟有运用西洋修辞学上一切质素,使得国语欧化”,他还可惜许多人学习西洋语

①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写于 1917 年,30 年代初即由青年诗人卞之琳译出。据卞氏自称,艾略特的注重传统与现代高度融合的文学观念深刻影响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整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新诗。艾略特的原话是:“对于任何一个超过二十五岁仍然想继续写诗的人来说,我们可以说这种历史意识是绝不可少的。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个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一代了如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中译文参见李赋宁译注《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 页。

② 西南联大青年诗群的学艺情况,参见张新颖:《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第八章”之第一、第二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194—203 页。

言文字的方法,只是偶一为之,“总有点不勇敢的心理,总不敢把‘使国语欧化’当作不破的主义”,这是符合事实的。^①敢于“把‘使国语欧化’当作不破的主义”的,大概就是穆旦吧。但穆旦同时也在《五月》一诗中故意采用中西古今杂糅的方式,造成特别刺目的不协调效果。只要是他的诗歌所需要的,他几乎全无顾忌,而过于丰盛的年轻的生命也不允许他的诗语过早定型:

虽然我还没有为饥寒,残酷,绝望,鞭打出过信仰来,
没有热烈地喊过同志,没有流过同情泪,没有闻过血腥,
然而我有过多的无法表现的情感,一颗充满着熔岩的心,
期待深沉明晰的固定。一颗冬日的种子期待着新生。(《玫瑰之歌》)

他既可以依托雄伟的自然存在而唱出崇高的颂歌,也可以将沉郁与悲壮驯服于细腻的观察,寄托对民族历史的恢弘想象:

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赞美》)

冯至诗受德国后期浪漫主义诗人里尔克、荷尔德林影响,采取较严格的十四行诗体,无论精神还是语言形式都充分欧化了。^②但步入中年的诗人在细吟密咏

①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出版公司1935年版。

② 关于冯至《十四行集》的受德国现代诗歌的影响,参见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第八讲第一节“德语文学的春风吹拂下萧萧玉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文长达75页,是迄今为止解析冯至《十四行集》用功最勤者。

之间，仍然努力回归变动不居的汉语的本体，充分玩味每一个入诗的汉字的音色与意蕴：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
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
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
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
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十四行集》之一）

30年代上半期在德国留学时，冯至就宣布告别自己20年代的诗歌，要以“小学”的功夫来熟悉中国的字词，看来他是信守了自己的诺言的。^①如果说穆旦的语言是“外发的”，冯至则是“内涵的”^②；如果说穆旦“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他在这里的成就也是属于文字的。现代中国作家所遭遇的困难主要是表达方式的选择。旧的文体诗废弃了，但是它的词藻却逃了过来压在新的作品之上。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典籍的彻底的无知”^③，那么，冯至的诗语则是充分的欧化与充分的中国化的融合。师生两代诗人在南方的天空下按照各自的秉性自由生长，“五四”以来文言、白话、欧化的语言因子在他们身上都有斑驳的投影。

① 见冯至1932年致杨晦信，转引自杨镰辑《沉钟社书信选粹》（之二），《作家报》1995年5月20日。

② 傅斯年在《新潮》杂志第一卷第五期的《随感录》中认为，鲁迅的文章是“内涵的”（Impressive），而区别于“外发的”（Expressive）文章。我这里虽然是借用来形容冯至、穆旦诗歌语言的不同特点，但与傅斯年的原意仍然有关。傅从鲁迅文章（语言）拈出“内涵”、“外发”一对范畴，确实切中了现代汉语写作的要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都是现代中国作家两种主要的语言特征。

③ 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见曹元勇编：《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

在上海。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进占上海租界,“孤岛”沦陷,大批文化人或被迫迁移内地,或韬光养晦转入地下以免为敌所获。恰巧这时,钱锺书从湖南回家探亲被困,只好隐居创作;就读于香港大学的张爱玲也被迫辍学,于1942年下半年回沪,决定卖文为生,并很快于次年一飞冲天。钱、张的文学渊源当然都不限于40年代初的上海孤岛,我们可以很容易将他们纳入“五四”至40年代“语体文”(即现代白话文)逐渐成熟的过程,但这条清晰的文学语言的历史脉络也只有到了1942年前后,才真正在这两个身居上海的天才作家身上,借“不受欢迎的缪斯”的照拂^①,将各种语言要素相对平衡地安排配置,从而结出了丰美甘甜的硕果。

张爱玲自幼敏感多思,酷爱读书,先是古书,后是新文艺和民国通俗文学,在教会中学又通过英文直接诵习西洋文学,古今中外的良好修养,雅与俗的广泛兴趣,使她的文章特别的摇曳多姿。十八岁应征《西风》杂志的征文《天才梦》就有不少早熟的隽语:

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 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颠的绿叶。在没有人與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1942年回上海后,最初用英文给 *The XXth Century* (《二十世纪》) 投稿,步中学时代崇拜的林语堂的后尘,用灵动波俏的文笔给外国人介绍中国。这个短暂的英文写作阶段很快因为在中文写作上的大获成功而中断,但她并没有放弃这些作品,在创作中文小说随笔的同时将它们一一翻成中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 改为《更衣记》, *Wife Vamp Child* 改为《借银灯》, *Still Alive* 改为《洋人看京戏及其它》, *China's Education of Family* 改为《银官就学记》, *Demons and*

① 美国学者耿德华(Edward. M. Gunn)研究孤岛和沦陷时期上海文艺活动的著作《不受欢迎的缪斯》,中文译本《被冷落的缪斯》已由新星出版社于2006年8月出版,这里只借用他的书名而已。

Fairies 改为《中国人的宗教》。这些后来都收入 1945 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流言》：

现代的中国是无礼可言的，除了在戏台上。（《洋人看京戏及其它》）

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的贴身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更衣记》）

对于生命的来龙去脉不感兴趣的中国人，即使感到兴趣也不大敢朝这上面想——中国人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在这范围内，中国的宗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确定的、无所不在的悲哀。（《中国的宗教》）

奇崛峻拔，不肯落入凡庸，虽然未能避免早熟的天才的青涩和张扬，但人生体验的深透与修辞造语的精绝，毫不逊于许多老作家。就文体来说，脱去了 20 年代的生硬和 30 年代的驳杂，呈现出 40 年代特有的知心贴肉的圆融畅达。这种语言施之小说，更显精彩：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有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去，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金锁记》）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欧化，哪里是口语和文言的杂糅，化合得天衣无缝，描写起来似乎也就无坚不摧，无往不利了。

钱氏更博闻强记，旧学根底扎实，英文尤佳。1941 年出版的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是对人生远距离的观察玩味，而糅合中西语言的文体尤见灵心妙识，以至于偏要通过魔鬼之口才能够痛快道出：

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为别人作传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你若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须看他为别人作的传;你若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作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人类的灵魂一部分由上帝挑去,此外全归我。谁料这几十年来,生意清淡得只好喝阴风。一向人类灵魂有好坏之分。好的归上帝收存,坏的由我买卖。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忽然来了个大变动,除了极少数外,人类几乎全没了灵魂……

有种人神气活现,你对他恭维,他不推却地接受,好像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附缴利钱。另外一种加谦虚,人家赞美,他满口说惭愧不敢当,好像上司受贿,嫌数量太少,原璧归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魔鬼夜访钟书君》)

作者尤其经心于讽刺语言本身的锤炼:

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

猪是否能快乐得像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人会容易满足得像猪,我们是常常看见的。(《论快乐》)

旨在显示主体优胜的讽刺很容易演成智慧的操练和语言的炫耀,但毕竟才高,抓得住讽刺对象,到底不失分寸:

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材料,这种笑本身就可笑……(《说笑》)

在非文学书中找到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旧衣服,忽然在夹袋里发现了用剩的钞票和角子;虽然是分内的东西,却有一种意外的喜悦。(《释文盲》)

这些撮取英国随笔精华、充满尖利的人生讽刺和洞见的诙谐智慧之作,使钱氏成为现代随笔领域继徐志摩、梁遇春之后又一欧化和本土化双修的俊才。

在重庆。一批流浪型文学青年围绕在批评家和诗人胡风周围,克服了生活的困难而疯狂写作。1942年,胡风出版了评论集《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他在抗战胜利前夕出版的《在混乱里》所收文章也都写于1941—1943年之间。胡风这一时期重要论著《论民族形式问题》写于1940年并于年底出版。在这些论著中,他顽强坚持自己所理解的由鲁迅开创的“五四”新文学传统,探讨这个传统如何在战争的复杂形势下取得新的发展,为此他四面出击,和来自左右双方各种文艺政策和文学理论激烈论辩。批评家胡风的存在不仅在历史传承的角度显明了40年代中国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谱系关系,也在现实拓展的角度使“陪都”重庆获得了一种特别的文学性格,影响了许多青年文学家的创作。年仅十七岁的路翎就在这种空气中执笔写作《财主底儿女们》。这部混乱年代“青春底诗”^①,1941年写出初稿,1942年被胡风丢失在香港的炮火中,却因此刺激作者更紧张地重写,两年后终于捧出煌煌两巨册。他的另外两篇名作《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也都完成于1942年。

《财主底儿女们》不仅是现代小说叙事奇观,更是现代中国文学语言的奇观。路翎的语言既无穆旦的风神俊朗,亦无冯至的冲撞与矜持抵达宁静肃穆的张力结构,更无钱锺书、张爱玲文言、白话和西语交错并施造成的富丽畅美,他只有浓得化不开的过激的欧化,却又并不完全是“五四”初期至20年代幼稚而饱受诬蔑的“恶劣的欧化”的延续,而是40年代业已进入现代汉语本体并贴近青春生命的成熟形态的欧化。

如果移目观看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又是另一派迥然不同的语言景象了。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第二年,“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②的作家赵树理一年之内连续推

① 胡风:《青春底诗——路翎著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序》,见《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

②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原载1946年8月15日《解放日报》,见《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6页。

出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和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接着又发表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虽然整个文坛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大肆宣传赵树理，将他视为《讲话》精神的实践甚至确立为“方向”^①，但在整个北方，经过延安整风，艾青、丁玲等30年代著名的左翼作家进入创作停顿期，新的秧歌剧与新民歌尚未崛起，身处太行山区的赵树理确实一枝独秀。稍后，从华北敌后辗转来到延安“鲁艺”当研究生和教员的孙犁，也在《讲话》发表之后两年连续推出初期代表作《荷花淀》、《芦花荡》等，开创了40年代以后革命文学独具风貌的浪漫主义一枝。赵树理和孙犁，一写三晋风习，一涉冀中民俗，语言上都部分地实现了“五四”以来文学大众化的理想，确立了后来中国文学语言的一个既旧又新的传统。

这些年轻作家的崛起，改变了整个中国文学的面貌，使大多数二三十年代成名的中老年作家黯然失色。中国文学在抗战以后第六七个头真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不必更多引用作品，也可以知道作家们的语言风格有怎样巨大的差异。由于战争造成的阻隔，同一时期这些出类拔萃的年轻作家在登上文坛之初彼此均无交往，互相不通声息，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再加上差异巨大的语言风格，很容易让后人由此将4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想象成一个各自为政的局面。犹如危难中的国土一样，这一时期的文学版图似乎也破碎不全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作家之间的人事阻隔和风格差异，固然呈现了40年代中国文学的多姿多彩，另一方面恰恰也因此更生动地显示了彼此的内在联结，即显示了他们的文学造诣乃是从同一个动荡不安而富有生产力的年轻的文学传统中自然而然演化出来。40年代初崛起的这批年轻作家，与其说是对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脱离和否定，毋宁说他们的成就几乎动员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整个中国文坛多个维度的努力的成果。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文学承先启后的清楚印记，因此完全可以被视为内部差异巨大却由同一个文学传统所支持的统一

①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发表于1946年，肯定他的创作是“实践了毛泽东同志文艺方向的结果”，而据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座谈会提出“赵树理方向”，则是1947年7月。

的作家群体。

语言方面亦复如此。表面上差异巨大的语言风格其实无不源于现代汉语的传统。4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语言并非散漫无归的分头演化,而是在差异中保持着紧密的结构性关联。即使撇开具体作品语言特征的分析,单纯考察文学语言背后一系列现代中国特有的语言观念的支持,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出,整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业已呈现的各种语言倾向,一些著名作家和学者围绕文学语言的无休止争吵,怎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这些年轻作家,又怎样在这些年轻作家的创作中被生动地实现出来,或者作出了某种微妙的调整。

二、“打扫”:一个既新又旧的语言传统的确立

赵树理、孙犁(或者还应该加上孔厥、康濯等一批年轻的“鲁艺”作家)在延安的崛起并非偶然,他们是“五四”以来文学大众化和革命化进程所结出的果实。40年代初延安和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文化政策,为他们准备了合适的空气和土壤,也为他们准备了一条合适的语言道路。二三十年代以来文学大众化的抽象理念终于在这时候获得了作家的主体情感与生活经验的血肉的内容。

“五四”文学革命一开始就追求文学的大众化,语言的大众化更是主要的目标。但无论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还是周氏兄弟都仅仅把大众化作为文学革命的一个遥远的梦想。胡适曾明确宣告中国文学将来一定要以语言文字彻底的大众化为目标,他甚至认为汉语书写的拉丁化才是文学革命最后胜利的标志。^①但是当左翼文化界向“五四”一代作家急切地要求大众语的时候,胡适又严厉批评他们急躁冒进,责问他们“大众语在哪里?”^②他当时实在看不到哪位作家真正有能力贡献出这种理想的“文学的国语”,相反他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用子虚

①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② 胡适:《大众语在哪儿》,原载1934年9月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收入商务印书馆《胡适论学近著》,见沈寂编:《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24页。